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QIAN SHI BUWANG

HOUSHI ZHISHI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

罗冠宗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

罗冠宗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罗冠宗主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5

ISBN 7-80123-489-8

I. 前... II. 罗... III. ①帝国主义-侵华-研究 ②基督教-文化侵略-研究-中国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522 号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

罗冠宗 主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剑 张越宏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45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印 数: 16501—26500

书 号: ISBN 7-80123-489-8/K·128

定 价: 28.00 元(平)

前 言

罗冠宗

历史是某一时期的终结,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持续;历史是已然的,现实是发展、变化的;历史记载的是过去,现实表现的是今天,但是历史和今天的社会发展又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永远是一本教科书,它记载着前人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为后人提供启示和告诫。人们只有认真对待历史,才能正确面向未来。本书以中国成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名,就是希望有助于基督教人士、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以及关心中国基督教的人们了解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这段不可忘记的历史。牢记它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基督教有关工作,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凝聚力。

近代基督教是在 19 世纪传入中国的,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不幸的是,基督教的传入又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而且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三自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使基督教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控制,使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利用的“洋教”,改变成为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开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在社会主义祖国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和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道路。

三自运动发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服务。三自运动发起后,1951 年在全国人民控诉、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高潮中,中国基督教人士也以亲身经历,揭发、控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严重罪行。经过基督教人士共同努力,根据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的言论、文章,又揭露了许多有说服力的材料。昔日他们在侵略风头上洋洋得意的言行,今天成了无法推卸的罪证,使我们对这个问题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自运动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我们过去所揭发的材料主要是一些摘录和单篇文章。近年来,许多人希望能把这些材料进行整理。

现在我们在前人揭发材料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重大事件,分别汇编。我们编写的原则是:①不是写中国基督教史,而是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历史;②内容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来写,因为脱离我们民族历史的实际,就无法理解当时外国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言行的实质;③在资料方面,尽量引用外国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的原话,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必要的说明、述评;④由于文章作者文风不同,我们不求统一;⑤过去在《天风》中登载过的一些有关资料放在附录,供研究参考。

二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一开始就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服务,从来没有停止过。固然在三自运动初期讲到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出于宗教感情,感到难于理解,有的人表示反对。以后随着大量史实的展现,许多人有所认识;现在,固然还有人对这个问题的不甚了解或了解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奇怪的是,竟有人说我们是

在“捏造”。为此,我们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1、揭发、批判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并非从新中国成立、三自运动开始。早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首先是教外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尖锐地抨击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尔后在同年5月举行的、由外国差会^①和传教士控制的“基督教全国会议”中,中国基督教代表也批评指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耻有相连的关系,西方自称“基督教国家”,违反教义,侵略欺凌我国,致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很大阻碍;他们还批评当时在差会和传教士“管教”下的教会其实仍是一个“外国教会”^②,所以受到外界的非难。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帝国主义枪杀我国同胞惨案的同时,爱国的基督徒也纷纷抨击那些“基督教国家”贩卖鸦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恶贯满盈;而有的传教士却违反教义,口是心非,包庇其政府的侵略罪行。这些,都是历史上教内外爱国同胞抨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的史实。三自运动发起后基督教人士和信徒揭发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

① 差会(Foreign Missions):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到别国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

② 1922年“基督教全国会议”大会会长减静怡博士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教会还是在外国人管教之下的”,“现今的中国人仍以基督教为一种外国教”。载《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24页。

国的罪行,实际上是基督教爱国先辈反帝爱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只是比他们批判的更深入、更具体,更进一步证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证据确凿,是无法抵赖的。

2、西方国家官员和基督教人士承认列强同基督教在政治、经济上密切关系的言论是很多的。比如:

美国原在华传教士、著名历史学家赖德烈对《中美天津条约》中得到所有差会、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欢呼的“宽容条款”批评说:“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在此他尖锐地指出:“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①

美国政府官员承认传教士对其外交活动作出重要贡献的事例很多,早期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福斯特(Foster, J.W.)在《美国在东方的外交》一书中,描写传教士对美国外交一些“丰功伟绩”的例子后说:“传教士对西方国家和远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其贡献特别显著”,“是一个绝对的需要”。^②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 13 年的田贝(Denby, Charles)说:

①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 279~280 页,1929 年。

② 巴顿:《传教士及其评论者》,第 119、156 页。

“近一百年来，男女传教士曾努力将我们的威望、语言和商业带进中国。如果把他们除掉，我们国家的声誉将会黯淡无光。无疑的，没有他们，我们的商业将受到重大损失，我们的外交将失去它主要的支柱。”^①

北美差会联合会在 1932 年的年度报告中，公开承认该会“所收到的电报和重要文件，包括重要的第一手情报，立即转送华盛顿国务院。”^②

1955 年 9 月 18 日，美国《基督教世纪》社论“冷战中的差会”，就传教士有无可能从事间谍活动问题时说：“从事间谍活动的罪状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推诿。”“传教士和差会曾经受到强大的压力，要他们把情况送交我们的情报部门备用。这个问题，许多传教差会内部关着门低声细语地也谈论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基督教联合会等几个主要教会团体在通过有关同中国关系的声明中承认：传教运动是西方为统治中国及其施加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以及他们在中国所属的教会，都是受到西方列强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的。传教运动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的密切联系损害了它对基督的见证，这使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

① 巴顿：《传教士及其评论者》，第 98 页。

② 转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 42 页。

中是和西方世界列强的权力与力量结合在一起的。^①

西方基督教学者批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以及有正义感、有良知的教会人士承认这种关系对传教运动造成损害的言论是很多的。说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3、现在我们编写这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要以历史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这个论断,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作出的历史结论。

三

既然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已是定论,而具体贯彻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又是同外国差会和传教士的活动分不开。对此,如何评价传教士的功过,就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传教士是传福音的使者,不能把他们与帝国主义侵略相提并论。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它既有传教士个人的奉献,而且有的事迹感人至深;但传教士又不能脱离差会和政府政策的联系。许多传教士在传福音的同时,还要进行别的活动,其中包括不同程度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政治活动。在三自运动

^① 参看《外国教会和教会领袖有关与我国教会关系的决议和讲话摘要》,本书第409页。

批判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以后,许多基督教人士在文章中提到传教士时,常常在前面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称号。对此,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改变,认为对传教士应按其不同情况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2000年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全体委员会通过的《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年的总结》这一重要文件中明确地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三自爱国运动在50年代曾经把一切外国传教士都称为‘帝国主义分子’,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根据传教士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而有所区别,凡所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①

如何评价传教士,关键是要根据各传教士的活动与其政府侵略政策的关系。

外国差会是竭力否认差会及传教士同其政府政策有关系的。最明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8日,北美差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给中国基督教领袖的信中说:“差会在华宣教的工作,从来没有与政府的政策发生过任何直接的关系。”^②话虽然讲得干净利落,但事实并非如此。

记得1943年美、英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

①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年庆祝大会专辑》第22页。

②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1950年7月号第5—7页。

条约”另订“新约”时,《基督教世纪》的社论说:“基督教差会之派遣到非基督教国家从事于宣教工作者,其与本国政府的政策所发生之关系,美国人士往往忘而不谈;但是,差会所到工作的国家,其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①社论的话很清楚,它承认差会和传教士的活动,同其政府的政策是有关系的。由于事实俱在,“差会所到工作的国家,其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只是美国人士不好承认,于是“忘而不谈”,其实是避而不谈而已。

事实上,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开始,就利用传教士为其侵略效劳,不少外国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参与贩卖鸦片、搜集情报、鼓动对中国发动战争,有的甚至直接参加侵略军、参与策划和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差不多所有差会和传教士都为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取得新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欢呼。许多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以殖民主义征服者的心态深入内地,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的反抗,酿成“教案”。而传教区域的建立和扩展,又是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紧密相连。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美、英政府和差会更加着重文化侵略,就是要培养一批在政治思想上顺服它们,能控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通过他们的

^① 美国《基督教世纪》1943年6月2日社论“踏上自由之路的中国宣教工作”。载《协进月刊》1943年6月复刊第3、4期第23页。

影响,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再发生反抗,从而达到比发动侵略战争更为有效的、在政治上完全支配中国的目的。表现在用传教、办学校、办医院、搞救济等办法来培养它们所需要的“人才”和收买人心;特别是在传教的同时,散布他们那套有利于为帝国主义侵略辩解的神学思想,更能欺骗信徒。

1931年“九·一八”日军入侵中国,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但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美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竭力诱使中国对日妥协,美国传教士到中国的布道、各种基督教国际会议,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都是按照当时美国对华政策行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为加强扶蒋反共政策,1946年甚至将著名传教士司徒雷登任命为驻华大使,他既公开执行美国对华政策,同时又指挥在中国的差会和传教士活动。

总之,外国差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从来都是同其政府的对华政策分不开的。一些知名的传教士,既是出谋划策,又是贯彻执行其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怎能说“差会在华宣教的工作,从来没有与政府的政策发生过任何直接的关系”呢?!

那么,是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是在政治上搞侵略活动

的呢？不是的。

许多传教士是抱着传福音的使命到中国来的，不少传教士为传福音奉献终身，他们翻译《圣经》，为文化交流、医疗卫生、移风易俗和社会服务等做了不少工作；有的传教士同情、支持辛亥革命；在 1937 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也有美国传教士和一些外国侨民冒着艰难险阻组织“安全区”，保护我国同胞等等，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但是，由于传教士来自美、英等国家的社会背景，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往往不能摆脱自己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观念；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整个传教事业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受差会派出的传教士无法摆脱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羁绊。

1、自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它们是耀武扬威的强国，中国是备受欺凌的弱国。它们富有、科学技术等很先进，而半殖民地的中国却是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外国差会、传教士有钱、有势，中国教会要靠外国差会资助，它们是“母会”，中国教会是“子会”，是传教士“管教”下的“母子关系”；教会的行政、人事、经济等大权都掌握在差会、传教士手中，许多传教士都抱有来施舍、拯救中国人的“优越感”。在 1922 年的“基督教全国会议”中，由于教会都在外国传教士“管教”下，中国教会领袖和代表只能很婉转地批评传教士在教会中“大权独揽”、“专制”，希望他们“消除国家及种族成见”等等。不少传教士

认为中国人贫穷、苦难,是因为不信上帝、有罪的关系,他们的国家强大、富有,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受上帝祝福的原故。他们可能不理解这种不同遭遇的命运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而这却是帝国主义利用传教所要传布的“道理”,即中国人民的贫穷、落后、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只有顺服,不能抗拒。说明许多传教士对其国家的侵略政策不仅没有怀疑,反以为荣,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国家对华侵略政策效劳。

2、由于差会听命于美国国务院,传教士受差会管理,传教士的自由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如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后,在1932年“一·二八”突然对上海发动进攻,极尽轰炸烧杀抢掠之能事。目睹此情景,当时在上海有105位传教士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军野蛮残酷的暴行,以此“诉诸普世同道,请本良心主张,对于穷兵黩武者之疯狂及暴戾加以反对。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手段。制止武力斗争。”这是传教士们出自人类良知,为维护人权和伸张正义的呼声。可是几天以后,北美国外宣教协会却发表《致美国及加拿大各教会的宣言》说:“远东的国际形势极为复杂,我们下判断应力求审慎而不该操之过急”,对中日问题,“切勿受那些不完全的、谬误百出的、过甚其词的报章记载的影响。”显然,这105位传教士的呼吁违反了美、英政府当时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就由差会出面

发宣言堵住他们的嘴巴。^①

又如抗战胜利前后在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由于同情和支持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同吴耀宗等一起参加学生们反内战的集会、游行，并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深信这样做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但是他的这些活动，由于违反了差会所遵循的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拥蒋反共的政策，遭到差会内部的反对，以至他不得不向差会辞职。^②

在第二次大战后，蒋介石政府独裁腐败，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政治上极端孤立。但美国政府始终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反共内战。而在华的传教士，绝大多数在政治上也是采取拥蒋反共的态度，这同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华圣经会传教士慕天恩认为要大量散发《圣经》以反对共产党，还要请司徒雷登大使致电美国国务院请示。又如在那个时候，在华传教士先是撤退，以后又不要撤退，要“留在中国原岗位上保持美国利益”，都是美国国务院向差会发出的指示。

至于搞情报活动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前述 1955 年

① 参看本书第 301—302 页。

② 文幼章：“深切怀念我亲密的朋友吴耀宗”，载《回忆吴耀宗先生》第 139 页。

9月《基督教世纪》社论中看到,是美国情报部门把“强大的压力”施加在传教士身上,要他们在中国进行情报活动的。这使我们看到,有的传教士搞情报也是无可奈何的。

总之,在传教士听命于差会,而差会又听命于其政府的体制下,不少传教士是不自觉地在贯彻执行其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只是怀着一股为传福音奉献的热忱,对此可能不了解,或不理解;有的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讲,只好“忘而不谈”,或关起门来窃窃私语。这是传教士的时代悲剧。

四

虽然是外国差会控制了在中国的教会,通过传教散布它们的神学思想,要使中国信徒顺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是一些爱国的中国基督教人士,特别是信徒中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1、在20世纪初,就有俞国桢牧师和一批教会知识分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保教条款,在上海发起脱离外国差会控制,不接受差会经济津贴,不分宗派,组织自立教会,提倡爱国爱教,自立自养自传,得到各地很多教会的响应,逐步形成自立运动;其发展时起时伏,又是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或挫折分不开。

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由于受